

居住在上海的外侨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以各种不同的方式，投身反法西斯战争，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。

以抗日复国为宗旨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，长期在上海活动。1932年，朝鲜义士尹奉吉用炸弹袭击日军，炸死炸伤日军总司令白川则大将、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等一批日军高级军政官员，炸得日军胆战心惊，轰动一时。

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中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日本军国主义的，也有一些人坚决反对日本的侵华战争。尾崎秀实从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，担任《朝日新闻》常驻上海的特派员，其间，他结识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，与鲁迅、夏衍、冯乃超、王学文、郑伯奇、田汉、成仿吾等都有很多交往，参加他们组织的进步文化活动，帮助他们开展“左联”的工作。尾崎秀实是“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进步人士的核心人物”。他与共产国际派遣来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联共（布）党员、德国人理查德·佐尔格合作，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转报莫斯科，经常“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”转告中国同志。

尾崎秀实后来回到日本，1941年夏，德国进攻苏联后，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成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关心的问题。值此关键时刻，尾崎秀实在首相相选得知日本决心同英美开战，通过佐尔格迅速发电，使斯大林决定西调远东军20个精锐师，在莫斯科危急时刻扭转了战局。世界上许多史学家称佐尔格、尾崎是

尽管奕劻“剿团和洋”的主张是一贯的，但在清朝统治集团决策过程中，奕劻并没有作为主剿派的领袖站出来。这除了对载漪和义和团的恐惧之外，和奕劻本人的性格是相一致的，他圆滑、巧诈，城府很深。他决不会像徐用仪、许景澄、袁昶等人那样，冒着杀身之祸，去拼命直谏，特别是看到慈禧战意已决，已经听不进“剿团和洋”的意见，在他看来，一味蛮干，于事无补。他更不想去握理力争，而是保持暂时的沉默，等待时机。但在私下奕劻仍然坚持他的“剿团和洋”主张，并做了一些牵制顽固派的事。当然，只要稍有压力，他就知难而退，又回到了沉默之中。6月15日，即第一次御前会议的前一天，袁昶上书奕劻，指出义和团“实属罪恶至极”，应“高悬赏格”，“格杀勿论”。奕劻当然是同意袁昶的观点的。当慈禧决定处死袁昶、许景澄以及立山、联元、徐用仪等五大臣时，奕劻无疑也是反对的，然而，他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去营救。《高栢日记》称：7月25日处决袁昶、许景澄前，袁禄求情没有获准，就去找奕劻一同再去。奕劻说：“我与若等耳，你求不行，我安能行者？如欲获准，非徐（桐）、崇（绮）一言不可。”奕劻明哲保身，圆滑处世的性格暴露无遗。

这期间，奕劻主要是和使馆区内公使们进行书信往来，要求各国外交人员到天津“暂避”，回答公使们提出的关于安全问题的疑问，向公使们介绍中国计划采取的保护措施，保证“万无一失”，等等。除此外，奕劻没有其他的作为，也难有其他作为。

1900年8月4日，八国联军分两路自天津进犯北京。8月15日清晨，慈禧带着光绪及大阿哥溥儀等仓皇出逃。留京办事大臣昆冈等见“各公使寻觅庆邸甚急，意在出以议款，甚至至邸宅探问多次”，奏请“仍令庆邸回京议约，便宣行事，与各国公使浹洽。”8月23日，昆冈等又上了一个奏折，转达总税务司赫德的话：“各国素与庆亲王奕劻办事多年，最为信服……必须三日内请庆王迅速会晤，以安宗社而救百姓。”昆冈解释，这是因为“庆王爷在总署办事多年，谨慎和平，为各国所钦佩，是以各国均愿与庆王爷早日商议和局大事。”8月27日，赫德又致函总理衙门，要求奏请皇上速行简派庆亲王来京议和，就在当天，上谕命“病滞怀来行馆”的奕劻“即日驰回京城，便宣行事，毋庸再赴行在”。

9月3日，奕劻在英、日军队护送下回到北京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六月，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，奕劻仍任总理部事。经过一系列交涉，1901年9月7日，奕劻代表清政府签订《辛丑条约》，为时正好一年。从和议开始到1901年2月底，奕劻等人主要与各国使节纠缠于所谓惩治“祸首”的问题，历时六个月之久，奕劻在“剿抚”政策上，和载漪等人尖锐对立，要不是处事圆滑，有可能弄到与被杀五大臣同样的地步。现在，作为全权代表，奕劻有清算顽固派的机会了。

“二次大战中最成功的谍报员”。他后来与佐尔格两人被日本当局秘密绞死。

鹿地亘是日本小说家，东京帝国大学毕业，与中国作家冯乃超同期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他发表了许多反战言论，因而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，被捕入狱。1935年，他和夫人池田幸子流亡到上海，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和反对日本侵华的活动，与宋庆龄、鲁迅等都有往来，并致力于《鲁迅全集》的编译工作。后来到武汉，在郭沫若领导下进行反战工作。1945年，他在重庆，单独受到参加重庆谈判的毛泽东的接见。

“八一三”抗战中，德国旅沪侨商总会主席普尔兴氏将全体德侨捐助的17510元赠给上海难民救济机构。

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从上海辗转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，在了解到新四军缺医少药时，她利用自己的私人关系求助英国朋友和美国红十字会，为新四军争取了一大批国际援助。

德籍犹太人记者希伯先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斗争，后参加新四军，在山东作战时牺牲。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在上海参加抗日斗争，后参加新四军，任纵队卫生部部长，被称为新四军中的“白求恩”。至1937年底，外国人士参加中国抗战的就有451人，另有白俄300余人加入中国籍，为中国作战。

1937年，法国天主教饶家驹神父倡导的南市难民区，成为数万难民的庇护所，也成为南京国际安全区的雏形。

1938年3月，以宋庆龄为主席的“保卫中国同盟”上海分会，主要负责接受国际上援助新四军的物资。

1939年，“保盟”上海分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，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派出民众慰问团，带大量军需物资，包括6000码蚊帐用料、20万片奎宁药、12万剂预防霍乱疫苗、2000个消毒包等，到皖南新四军军部，有力支援了新四军的抗战斗争。

1939年至1941年，英国人工业国际委员会主席何明华，通过外商在上海开办的银行转账，分批向皖南新四军和苏北新四军援助60多万元和大量的紧缺物资。

在近代上海奇特的政治格局下，这些侨民为反法西斯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

在电视连续剧《亮剑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，晋绥军团长楚云飞到八路军李云龙的独立团探虚实，正好遇上独立团打伏击，全歼日寇军官“战地观战团”。这场战斗，在抗战中是有原型的，那就是韩略村伏击战。指挥者正是李云龙的原型之一，时任八路军太岳二分区司令员王近山。

1943年10月，王近山奉命率16团赴延安扩编队伍，保卫陕甘宁边区。当时日寇正集中兵力在太岳区扫荡，敌情复杂，形势紧张。刘伯承师长下达命令时叮嘱王近山：“此次西行，你是独立作战，在敌众我寡时机变幻很快，而上级又无法及时指导的条件下，必须发挥我军机断行事的优良传统。”

出发的日子到了，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亲自送来送行，他再三叮嘱：“近山哟，此去任重道远，你千万要小心啊。记住，要尽快赶赴延安，路上不要求战。如发生战斗，也要力求速战、速决、速离！”王近山重重地点点头：“陈司令，我都记住了。”

一个漆黑的夜晚，王近山率部出发。一路上机警地穿过田蒲路和汾河两道敌人封锁线，乘虚逼近日军前敌指挥所所在地临汾，在临汾东南的岗头村宿营。次日黄昏，尾追的敌人赶来，我军突然掉转矛头，逆敌北上，转到敌背后，一直插向韩略附近。王近山下令“改装”，于是1000多人都化装成老百姓，

在一个房间里，陪审团和模拟陪审团，讨论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，构成了《十二怒汉》和《十二公民》等法庭电影最大的看点。我看过这两部电影，当然被它们完全吸引，惊讶于靠对话支撑的情节，具有如此的张力。没想到手头这部以色列电影《诉讼》，故事还要简单，人物还要稀少，依然靠对话，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，一点也不让人昏昏欲睡。

结婚已二十年的一对夫妻，女的要离婚，男的不肯离，五年里频频上法庭，就是这么一个故事。场景也小得很，一间小屋子，三个法官，原告、被告和他们的律师，再加上轮流出现的几个证人，一台戏就这样开演了。编导之一是一位女性，叫罗内特·阿尔卡贝兹，她还是主演，演那个想离婚的妻子。当然，她有理由愤怒：在以色列，根据犹太教，男女离婚一定要得到男方的同意，否则，女方再有理，男方耍赖，一切免谈。“这造成了一系列戏剧和悲剧……你越觉得这有多悲剧，情况有多绝望，那它就越荒诞，越将你推入喜剧中，然后你只能笑，笑过后哭。”女导演这样说。

这是怎样一对夫妻呢？根据法庭所有问答环节，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他们的情况：妻子薇薇安，理发师，不信教，没有花边新闻，渴望家庭幸福，希望丈夫嘘寒问暖，偶有送花等浪漫举动；丈夫以利沙，有礼貌，好男人，好丈夫，上交工资，不乱花钱，不赌博，没有家暴，没有欺骗，为人低调。他们一直被认为是模范家庭，但妻子觉得丈夫从来没有正视过自己，一直把自己当成空气，三年前她搬离了家，和丈夫分居，现在她希望离婚。而丈夫却认为，他一直爱着妻子，给了她一切，希望她回家，不同意离婚。看电影的过程中，我一直在想，哎呀，这就是家庭，就是夫妻呀，就像女导演说的：“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，没有所谓的赢家或输家，我创造的是一个临界的情况，我不想明确说出谁好谁坏。”尽管如此，我们却要思考：两个好人是否一定适合在一起，夫妻如何协调，婚姻到底是什么，该采用什么方法维持婚姻，要改变自己还是改变对方。

我倒是很佩服编导的功力，在这么单一的内景，用对话扯出一段很平常的故事还很吸引人，用什么办法？当然，首推证人轮流出场。七名证人，有的是妻子的，有的是丈夫的，身份不一，性格不同，通过双方律师的询问，挑起话头，故事就有了向外扩展的可能。妻子的证人之一——她的哥哥，一开始，倒好像和他妹妹离婚立场不一致，一个劲赞扬起妹妹来，引得妹妹苦笑摇头。那对邻居证人夫妻，说着说着，说起他们自己不平等的夫妻关系来。令人发噱的是，有一个证人，竟然直指薇薇安和她的律师在咖啡馆约会，惹得律师和丈夫都暴跳如雷。其实，整部电影，就是因为法官、双方律师、丈夫、妻子，还有证人，话题接话题，话题引话题，互相缠绕，绵延回环，变得丰富起来。

婚是离还是不离，电影就这么纠结着，审理冗长的五年，用字幕“六个月后”“三个月后”“两个星期后”倒很快过去了。在庭审那边，固执到可恶的以利沙，一直不松口，有几次干脆不出庭，甚至被法官判坐几个月的牢，等到终于同意离婚了，在最后关口，又改主意。有一次，已经举行离婚仪式了，在宣誓“从此以后，你可以与其他男人交往”条文时，以利沙又紧急刹车。法官被弄得疲惫不堪，薇薇安情绪失控，先是大闹法庭，被驱逐，两年不能踏进法庭，后对以利沙几乎崩溃地恳求：“求求你，放我自由。”电影看到这里，连我们都要绝望了。

最后，婚还是离成了，不过，以薇薇安“不再和其他男人交往”为交换条件。这种限制性的自由有点可悲，但又能怎么样？对薇薇安来说，谢天谢地，终于可以摆脱眼前这个男人了。

在敌人眼皮子底下，于22日到了韩略村。

韩略，是临汾（汾）屯（留）公路上的一个小镇，距临汾只有几十里。这一带物产丰富，群众条件很好。老乡们听说八路军来了，都喜出望外，忙着腾房子、烧水、做饭，把最好的东西给战士们吃。当晚，王近山和16团的领导们顾不上休息，即刻听取地方党组织汇报。

从掌握的情况来看，敌人对眼皮底下这片地区十分麻痹，每天上午都有若干辆汽车，满载物资，在少数部队掩护下由临汾开来，经过韩略村，去支援“扫荡”我根据地的敌人。下午又满载从我根据地劫掠的财物粮食回临汾，并沿途肆意骚扰，老百姓都对他们恨之入骨。

经过分析研究，王近山和16团的领导都认为这里地形很好，既利于隐蔽也利于出击，加上有可靠的群众掩护和民兵的配合，真是个理想的作战地点。虽然部队主要任务是赶赴延安，但战机不可坐失，正好乘敌不意，攻其不备。

仗是打定了！但王近山非常谨慎，带领团营干部化装侦察，摸清了敌情和地形。他

爬树，可以说是农村小孩子的第一技能，谁不会爬树，是要被人嘲笑的。

北方农村主要有榆树、槐树、杨树、柳树、梨树、果树、枣树、杏树等。果树和梨树、枣树主干较短，几下就可以爬到第一个分杈处。上到树上，横枝很多，便可手脚并用，随意攀爬了。榆树和槐树有的长得很高，但主干大多有些略微倾斜，更重要的是，表面非常粗糙，布满龟裂、粗黑的表皮，不仅摩擦力大，而且有些大点的缝隙可以容进小孩子的手指，上树非常容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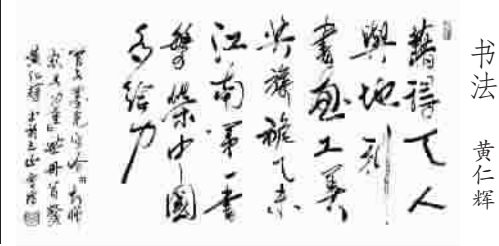
小孩子上树，一般依树的粗细，采取两种方法。较细的树，用胳膊一上一下环抱住树干，两腿同样一上一下盘住树干。身体稍成弓形，手先向上，抱住上面一个位置，腿随即跟上来。要尽量多向上移一些。身体弓得更厉害，这样下一次身体向上伸直，胳膊重度抱树时，就可以攀过更长一段树干。如此反复，很快就上了树。树干粗，胳膊腿抱、攀不住，爬起来就困难难了。

具体方法，是用手臂和腿夹住树干向上爬。这样，裤子要始终紧紧在树干上摩擦，很容易磨毛磨破。而破了裤子，可不得了，大多要挨上几巴掌。

最难爬的，是杨树。杨树表皮光滑，常常连一个树结都没有，有的滑得抱都抱不紧。而且是直立茎，又高又直，离开地面四五米，都不出一个横枝。结果，常是上一步落半步，事倍功半。好在杨树都比较高，胳膊和腿都能抱盘住主干，稍微点劲，也是可以上去的。爬杨树还有个最大的好处，就是下树非常利索。胳膊腿稍微松一点，便可以溜滑下去。

俗话说，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。树上多了，总有机会掉下来。我现在记得，自己至少从树上掉下来两次。一次，看到杨树的第一个横枝上住着一窝小鸟。这肯定不是麻雀。麻雀窝都是在房檐下或墙洞里的。能掏到小山雀，或山雀蛋，多好啊！当时刚下过雨，树枝更加湿滑，而且一动，树叶上的水珠就掉下来，落在头上、身上，还有眼睛里。好不容易抓到第一个横枝，本想先探头看看窝里是蛋还是小鸟，不料“咔嚓”一声，树枝断了！我应声而落，不妙的是，下面是个小排水沟，为了加固，沟边沿放了一些小块石板。我仰面朝天掉下去，肩膀正砸在石板上，当时就一阵剧痛。挣扎着站起来，肩膀已痛得不能动了。真担心骨折了！一直肿疼了好多天，才慢慢缓解。

另一次是在树上摘杏。杏树主人收获时，有些长在特别远的枝头，很难够得着的杏，便会留下来。但这类杏往往是最大、最红、最好吃的。因为长在枝头，没有其他枝叶的遮挡，光照充分，而且在树上时间长，非常成熟。孩子们难抵挡诱惑，便会想办法把它们弄到嘴里。这种行为有个专门名词叫“遛杏”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，好杏赖杏，也得到树上遛遛。我发现一个远处的横枝尽头，有个特别艳的杏，但横枝上头根本没有可以抓手的树枝。我双臂平伸，慢慢地走到枝头，小心翼翼地蹲下身，去摘杏。结果，稍一用力，树枝便晃了，我一下子失去了平衡，从树上摔了下来，手里还捏着那只杏呢。



先将随行非战斗人员和辎重转移到安全地带，留下4个连队执行伏击任务。

部队在群众掩护下隐蔽了两天的24日晨3时进入韩略村西南公路两侧伏击区。8时许，敌汽车13辆（内含小汽车3辆）由临汾开来，钻入我伏击圈。我预伏部队给敌以突然火力袭击后，即与敌展开白刃战。

战斗中，发现中间有一群带指挥刀的敌人，周围鬼子向他们靠拢，看样子是想拼命把这一堆带指挥刀的长官救出去。王近山判断被围的可能是个指挥机关，便立即命令部队集中力量，尽快消灭这股敌人。

冲锋号一吹，5连指导员郑光南抱起一堆手榴弹就冲向敌人一个火力点。一声巨响，敌人机枪哑了，郑光南指导员也倒在那里。战士们高喊着复仇口号，如狂风般横扫敌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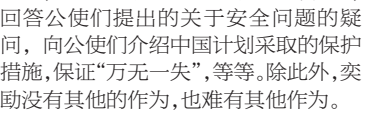
经3小时激战，日寇120余人除3人漏网外全部被歼。从当场缴获的文件中查明：这股敌人系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组织的“战地观战团”，从北平前来专门参观“铁滚扫荡”新战法。“观战团”成员包括少将旅团长1人，大佐联队长6人，少佐10余人。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战没观成就成了八路军的剑下鬼。

明刊《滑石片创新战绩》。

明哲保身 等待时机

大清「裸官」奕劻是怎样「炼成」的（六）

纪连海



在敌人眼皮子底下，于22日到了韩略村。

十日谈

敌后歼寇记